

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 基础和策略分析

周良沱,刘须群等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江西 南昌 330103)

摘要:罗马教廷是世界天主教中心,而东欧如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等国家多数公民信仰天主教,罗马教廷在东欧国家国民中影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罗马教廷凭借强大的宗教力量,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干涉主权国家宗教内部事务,教皇亲临动乱国布道演说、教廷与世俗政变力量联手等策略成功颠覆信仰天主教占多数的公民国家政权,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国家性质发生改变。

关键词:罗马教廷;东欧剧变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121(2008)04-0102-05

1990年前后,东欧国家和平演变,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罗马教廷在1989年前后的东欧剧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社会基础有哪些?它的干预策略有哪些?尽管东欧剧变已过去近20年,分析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条件及策略,对于当前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借宗教名义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基础

(一)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公民信仰罗马天主教

根据欧盟2005年统计,天主教是欧盟成员国的第一大宗教。^[1]比如波兰人口3863.2万(2001年底),全国约90%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斯洛伐克人口530多万(2005年12月),60.4%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捷克人口1021万人(2004年5月),主要宗教是罗马天主教。匈牙利人口1017.5万(2002年1月1日)。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66.2%)和新教(17.9%)。斯洛文尼亚人口:198.8万(1999年12

月),主要宗教是罗马天主教。统一之前的民主德国约有3000多万人教徒,其中约2000万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占宗教信徒的70%以上。

东欧国家有浓厚的罗马天主教信仰氛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历史上,罗马帝国曾统治东欧数百年为宗教扩张奠定了基础。在现代,东欧国家相继获得民族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由于信仰宗教的国民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在民间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加上东欧国家政府对宗教普遍实行宽容政策,导致这些国家宗教狂热情绪持续高涨。比如波兰,1970年底波兰总书记盖莱克上任后,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政府被迫对教会做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甚至可以说是妥协。在70年代,政府大量地增加了用于修建教堂的经费。1971年至1974年间,政府批准修建了150座教堂和祈祷所,使教会拥有的各种教堂和祈祷所达13,643座,仅1979年在华沙就开始兴建教堂14座。与此同时,政府增加了神学院的招生名额,为教会造就神学人

收稿日期:2008-03-26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公安部级公安理论基金项目《天主教地下势力与国家安全研究——以抚州为例》。本文系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为周良沱(主持)、刘须群、章剑、董利、田军、李群。

作者简介:周良沱(1948-),男,重庆铜梁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教授,研究方向:犯罪学、社会学;刘须群(1974-),男,江西吉水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安基础理论。本文执笔:刘须群。

才创造了条件。在政府放宽宗教政策的同时,教会利用了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渗透,并扩张其势力范围。1976年,教会同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宪法修改工作,公开反对在宪法中写进波兰党对波兰人民领导作用的条款。由此可见,教会力量已渗透到了国内政治生活。^[2]

(二)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

梵蒂冈,拉丁语意为“先知之地”,它是全世界10亿多天主教徒的圣地和精神中心。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天主教神权国家,它的一草一木都沉浸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举一动无不带上神圣的宗教色彩。^[3]公元756年,统治罗马帝国的法兰克国王与罗马教会的主教达成一项交易,罗马主教给法兰克国王加冕,承认其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法兰克国王则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名义把意大利中部的土地馈赠给了罗马主教,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主教,帮助他建立世俗国家,使他取得世俗君主地位,罗马主教以此被称为教宗,我国习惯称“教皇”,他所统治的国家称为教宗国。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教皇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宫中,从不外出,人称“罗马的囚徒”或“梵蒂冈的囚徒”。^[4]1929年2月11日,意大利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其主权属于教皇,教皇正式承认教皇国灭亡,另建梵蒂冈城国。条约规定将罗马城西北角名为梵蒂冈的小山丘上圣伯多禄教堂及周围共0.44平方公里的一小片土地划归圣座,建立正式名称为“梵蒂冈城国”的国家,从而解决了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政府长期争端的“罗马问题”。梵蒂冈虽有国家形态,但它主要是建立于全世界教徒之信仰基础上,故其政治制度不同于一般国家。按照教会法规规定,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各地天主教会的“中央政府”,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团体是梵蒂冈派往各地的下属机构,代表基督传播福音。正如汉斯·昆教授在《论基督徒》中所说,各地教会团体是“按照基督的吩咐,往全天下为他作见证,放牧他的羊群。”梵蒂冈在世界天主教会享有主教任免权、各教区重大事项决议权、赏罚权、公会议召集权等权力。各地天主教团体必须绝对服从梵蒂冈的领导,忠实地执行它的指令。

(三)教宗具有至高无上的“首席权”

“教宗”(英文 pope)亦称“教皇”,该词系由拉丁文 papa 译出,意为“爸爸”。这是早期基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的一般尊称。在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

基雅、耶路撒冷等较大城市之主教拥有宗主教衔。五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主教在西方的影响下逐渐加强。十一世纪东西方教会大分裂,“papa”一词在西部教会逐渐成为罗马主教专有称号,其“教宗”含义亦逐渐明确化。罗马教宗成为享有世俗权力君主和宗教神权领袖于一身。历史上曾有世俗君王主导教宗产生的情形,西罗马帝国时期,教宗就曾在世俗皇帝任命。1179年第三届拉特兰公会议,确定教宗仅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教会仍未完全摆脱世俗帝王的控制。直到20世纪初本笃十五世的选举起,教宗才完全由枢机主教选举。天主教会认为,耶稣在世时拣选了十二位宗徒,其中伯多禄(又译彼得)为宗徒之长。教会初期,伯多禄传教至罗马,成为罗马教会的第一位主教,亦即第一位教宗。所以,教会规定教宗即为罗马教区的主教、伯多禄的继位者、基督的在世代表、天主教会的领袖。^[5]1929年拉特兰条约承认,教宗为梵蒂冈的最高元首。世界各国的主教在神权上和教宗一样,都是宗徒的继承人。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规定了“教宗首席权”和“教宗永无谬误”信条。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上规定了教宗在当信当行的教义和教规上享有最高的特恩。教宗的特殊地位、实际权力、对国家的影响扮演着神权领袖和国家元首的双重角色,他既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又是位高权重的政府首脑。作为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化身,教宗是连接虚拟天国和善男信女的桥梁。他的宗教职责就是传经布道,争取教徒,扩大天主教和自己的影响力。作为国家首脑,教宗还具有君主所具备的世俗权力。集神权与君权于一身的教皇,在国内自然一言九鼎,而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二、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策略

(一)罗马教廷干涉东欧国家内部宗教事务

罗马教廷直接任命一批长期持反共、反政府立场的红衣主教、主教、副主教,从组织上渗透和培植反共势力,进而加强对东欧天主教的控制。主教制是罗马天主教教阶制的核心,主教执掌教区的组织权、神权、财权。领导和组织教会生活、管理教会财产,解答信徒有关信仰问题的问询和对各社团之间出现的纠纷作出仲裁。^[6]由此可见,在天主教组织系统中,主教的权力、影响力、作用和地位绝对不能忽视。罗马教廷为了把东欧宗教势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利用教宗首席权反对东欧各国政府建立的神父协会选举的主教,并且以拒绝承认和“超级惩罚”参与自选的教会和信徒来威胁各国自选主教。为了加强对东欧国家宗教势力的控制,利用近代形成的教宗首席

权,任命一批反共、反政府意志坚定的主教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忠实地执行和贯彻教宗的意图,不断向社会主义发动攻势。

1948年任命的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以强硬反对政府而著称。维辛斯基曾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波兰灾难的本质在于‘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我们为这场冲突做准备的话,我们需要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以保卫上帝’”。他认为:“一旦波兰天主教化,共产主义就会自动垮台。”^[9]维辛斯基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支持反苏、反政府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压,所起作用曾得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赞赏,高度评价红衣主教在和平地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和“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的策略。^[10]维辛斯基去世后,1983年教皇把红衣主教的帽子加给波兰另一位大主教格莱姆普,格莱姆普控制的波兰天主教会违背“天主的归天主,恺撒的归恺撒”政教分离原则,逼迫波兰政府答应:教会在教堂内从事的任何活动,包括反政府宣传,都不得加以干涉,军警不得进入教堂院墙,教堂成了大量反政府分子的庇护所。同时教堂也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中心,不少神父在教堂内布道时含沙射影地反对社会主义,许多教徒在做完弥撒后走出教堂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11]1983年任命的南斯拉夫大主教库哈里哥,一直批评南斯拉夫政府无神论的教育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教皇任命的托马谢克大主教要求政府彻底修改国家的宗教政策,要求教会与政府平起平坐,进行“对话”。1983年罗马教皇还在苏联、立陶宛任命了两名持反共立场的主教,在里加任命了一名副主教。^[12]由此可见,教廷对主教任命权的争夺,其真实意图旨在为其思想渗透奠定强有力的组织基础。由教廷任命主教,由主教影响和控制教会、教徒,煽动教徒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政府,这一策略最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政权,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二)教皇对动荡不安的波兰政局推波助澜

教皇前往波兰通过布道、演说、教晤、做弥撒等形式,宣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唤醒人们“自由觉醒”,进而从思想上加强了对教徒的精神控制。使教会成为反政府派的中心,煽动教徒狂热的宗教热情上街参与反政府游行示威,干预国家政治,向政府步步紧逼直至政府垮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先后在1979年、1983年、1987年、1989年四次访波,聆听他布道讲话和参加弥撒活动的信徒分别达到300万、665万、1000万、1200万人,盛况空前,影响巨大。波兰右派学者米奇

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描写了这种影响力:1979年,当保罗二世第一次以教宗的身份访问波兰时候,他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在苏联的阴影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高压下挣扎的波兰人民感到,“我们被世界选中了,好像世界最终注意到了我们,最终选中了我们”。^[13]这次访问成为司徒科夫斯基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洗礼”。米奇尼克描述道: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个都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期剥夺了真正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14]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于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1983年,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时,在华沙机场向那些被政府囚禁和迫害的人致敬:“我要求那些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在总统府会见教宗之后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15]从这些西方学者的描述中,人们能够看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四次访波之旅在教徒中点燃了一次比一次狂热的宗教热情,产生了海啸般的社会影响。

波兰籍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躬亲波兰等国的传教布道、演说,扩大了罗马教廷影响,在东欧剧变中起了强大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作用。教皇四次访波超出了宗教领域交流访问,而是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前往波兰,是颠覆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点火者”。约翰·保罗二世公然宣称:要用“个人的道德立场”去“击退共产主义”。他到波兰时,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他的教晤,充分显示了他“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的能力”(《路透社评论》)。1983年6月,他第2次访问波兰时,接见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一家,发表了许多危害波兰局势稳定的讲话,使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团结工会又开始活跃起来。教皇离开波兰后,波兰不少地方就发生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出现反政府的传单和团结工会的旗帜。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访问波兰,迎送教皇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据报道共达1000万之多。在访波期间,他明确表示,波兰教会“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强调教会“应该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

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无怪乎瓦文萨在罗马教皇第四次访波时直言不讳地说：“没有罗马教皇的祈祷和工作。就不会有团结工会，更不会有波兰的‘八月’和自由的胜利”，“自由的波兰是教皇亲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7]

(三) 罗马教廷直接干预波兰内政

教廷利用手中掌控的强大宗教力量介入政治领域，直接干预甚至左右波兰内政。这是教廷又一渗透策略。波兰是欧洲天主教势力最强的国家，天主教的影响很大。在 3800 多万人中，天主教徒约占 90%，党员和军队中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对波兰天主教徒来说，他首先是教徒，然后是党员和军人。波兰的天主教会实际上扮演“潜在政府”角色。当国家被肢解时，教会在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家独立后，教会的威信和社会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它不仅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有形式上的自治机构。^[8] 每当波兰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宗教力量便走出教堂，介入政治领域，成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争相寻求合作的力量。罗马教廷洞察了这点，抓住时机，利用自己在波兰天主教徒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当各派“中间人”调停冲突，从而间接达到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目的。1981 年冬天，波兰的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平息工人的罢工，并担心苏联出兵干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在此过程中，军队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在圣诞节前夕的 12 月 18 日，保罗二世给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写了一封呼吁信：自 12 月 13 日宣布军管以来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已经导致我们同胞的伤亡，这促使我向您发出紧急而又诚挚的呼吁，恳请您结束波兰的流血。……为此我向将军您呼吁，重新回到自 1980 年 8 月以来要求社会进步为特征的和平对话的途径上。尽管这可能是很困难的事，但决非不可能。……整个民族的幸福全都系于此。全世界人民、所有关心通过尊重人权来促进和平事业的人们，都期望着我们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来。全人类对和平的渴望要求波兰结束军管状态。教会是这种希望的代言人。圣诞节即将到来，波兰的几代儿女将被圣餐聚集到一起。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同胞不致被镇压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圣诞。我向将军您的良心，以及所有必须对此做出决定的人的良心呼吁。波兰教会的软弱“接受强加给它的游戏规则，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中一支不结盟力量。”^[9]

从这封柔中带刚的信件中，我们可看到教皇干预波兰内政的决心及透露出来的信心。事实也证明

了罗马教廷的强大干预力量。1989 年，波兰政局激烈动荡，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斗争进入到你死我活阶段，此时的波兰天主教会异常活跃，一方面，大量教徒直接参与罢工、示威游行等政治活动，公然站在团结工会一边。另一方面，教会充当“中立者”，穿梭于政府和波兰团结工会之间。“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波兰教会克服了冷漠和恐惧，与团结工会并肩作战，成为专制肆虐的时代波兰社会公义的象征。”神父们在讲道中号召信徒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必须表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神父带领数十万信徒，手持点燃的蜡烛走上街头，这海洋一般的点点烛光，终于让那些奉命前来镇压的军队调转了枪口。瓦文萨也认识到蕴藏于民间、蕴藏于教会的不可摧毁的力量的源泉：“基督的道德和波兰的传统是那样牢固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个性中。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设想未来。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基督的教会中寻找鼓舞我们的力量。”^[10]也正是有罗马教廷支持的强大教会力量存在，教会才能有足够的实力与政府和团结工会之间沟通、参与和斡旋，1987 年，波兰政府向团结工会妥协，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签署了多份妥协的文件。教会也因此逐渐成为波兰“国家政治版图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11]

(四) 罗马教廷与反共的世俗势力互为策应

教廷与波兰团结工会、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势力等世俗反社会主义力量合流，互相支持策应，共同分化瓦解东欧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动摇执政地位。1978 年，罗马教廷第一次选出了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新教皇。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波兰人，真实名字为卡罗尔·沃依蒂瓦，他原是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政治上属于亲美的宗教领袖。约翰·保罗二世能够成为教皇，主要源于背后美国的推动。美国可以借用罗马天主教这个庞大的组织，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可以说，“来自东欧的自由势力代表被推举为教皇，是成功地在共产主义统治的铁幕上打入了一根钢钉”。^[12] 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与约翰·保罗二世的关系远非寻常。1982 年，美国总统里根在梵蒂冈图书馆与约翰·保罗二世秘密进行会谈，由此加紧了对铁幕国家尤其是波兰当局的颠覆活动。美国总统里根与约翰·保罗二世结成的所谓“神圣同盟”，即为摧毁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所结成的行动同盟。

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新教皇。作为回报，新教皇登基后，投桃报李，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积极推行他的“东方政策”，用“个人的道德立场”去“击退共产主义”，用

基督自由去拯救苦难中的波兰民众。^[9]这正是团结工会和西方“和平演变”国家所希望的立场,也是他们合作策应的政治基础。宗教渗透作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东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上,文化上甚至政治上的渗透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与西方国家策应外,教廷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策应则更为紧密和频繁。1980年8月,当瓦文萨开始创建团结工会的时候,曾经对工人兄弟们许诺说:“如果工会得以诞生,建立工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得到承认,那么我平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将是去罗马晋见教皇。”(《瓦文萨自传》)果然,1981年1月,瓦文萨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便是罗马,他获得了教皇的亲切接见,并与教皇一起到罗马郊外一个波兰移民旅馆里做弥撒。约翰·保罗二世在致瓦文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我认为,你们1980年8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和其他大工业中心所展开的冒险事业是人们普遍要求促进社会道德利益的情不自禁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行动,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波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要求得到进步的权利。……你们在整个秋天做出的巨大努力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这种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你们付出的努力不是反对而是为了全体波兰人民的共同利益。付出这种努力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的。这种权利为各国的法律承认和批准。”^[10]约翰·保罗二世认为,自己不仅需要公开支持同胞们的斗争,而且还要号召波兰教会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约翰·保罗二世与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之间建立起来牢固的联盟。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和大部分波兰人民一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将教宗看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在几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瓦文萨都不假思索地向教皇寻求智慧和支持:“从三年前我们举行罢工的第一次起,我便深深感到在精神上与教皇的一致。决定罢工时,我们承担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就是按照教皇的教导追求我们的目标。正是由于把这些教

导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才达到了一些目标。”瓦文萨曾评价:“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皇去世之后,瓦文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估说,促成波兰军管政权垮台的功劳,“百分之五十归教皇,百分之三十归波兰人民,百分之二十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1]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除了精神上支持外,19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等组织得到的活动经费,既有源于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出自梵蒂冈名下。^[12]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教廷与西方和平演变势力互相作用、互为策应,共同导演了东欧剧变这幕大戏。

参考文献:

- [1] 王娜.梵蒂冈的世界[J].百科知识,2008,(11).
- [2] 王东.简论战后波兰宗教问题[J].苏联东欧问题,1983,(6).
- [3] 经文纬武:上帝之城——梵蒂冈[EB/OL].<http://tieba.baidu.com/?kz=87289862>.
- [4] 任延黎.天主教知识读本[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7.
- [5] 周太良.天主教选举新教宗的程序[J].中国宗教,2005,(4).
- [6] 张艳丽.苏东剧变为什么首先从波兰开始[J].国际论坛,2000,(3).
- [7] 黄宏,谷松.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120.
- [8] 詹真荣.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处理国内宗教问题的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3).
- [9] [波兰]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M].崔卫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4.
- [10] 马举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2).
- [12] 神仙驴.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EB/OL].<http://www.junmeng.org/bbs/viewthread.php?tid=81079>.

责任编辑:章 剑

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基础和策略分析

作者: [周良沱](#), [刘须群](#), [ZHUO Liang-tuo](#), [LIU Xu-qun](#)
作者单位: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 江西, 南昌, 330103
刊名: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NGXI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年, 卷(期): 2008, "" (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1条)

1. [王娜](#) [梵蒂冈的世界](#) 2008(11)
2. [王东](#) [简论战后波兰宗教问题](#) 1983(06)
3. [经文纬武:上帝之城—梵蒂冈](#)
4. [任延黎](#) [天主教知识读本](#) 2000
5. [周太良](#) [天主教选举新教宗的程序](#)[期刊论文]-[中国宗教](#) 2005(04)
6. [张艳丽](#) [苏东剧变为什么首先从波兰开始](#) 2000(03)
7. [黄宏](#). [谷松](#) [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 1991
8. [詹真荣](#) [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处理国内宗教问题的教训](#) 1994(03)
9. [亚当·米奇尼克](#). [崔卫平](#) [通往公民社会](#) 2004
10. [马举魁](#)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期刊论文]-[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3(02)
11. [神仙驴](#) [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gzkxxxb200804019.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23599a42-a394-463a-b1dc-9e4d00976f6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